

「通識教育叢書」總序

香港中文大學創校於1963年。中大從開始即把通識教育課程列作必修科，以實踐全人教育的理想。在不同的年代，大學不斷改革通識教育課程，回應社會和大學的需要。2012年學制改革，大學乘此良機推出全新通識教育基礎課程，同學必須修讀中外經典，與師友互相切磋，思考人生，探索世界。我希望在此向曾為通識課程出一分力的同事致以衷心感激，也要向撰寫和策劃「通識教育叢書」的同事和朋友致意。

大學通識教育部自1999年與中文大學出版社合作，出版「通識教育叢書」。出版通識教育書籍，是要傳播通識教育的精神，並以簡潔的文字，向社會人士介紹不同學科的知識。2005年起，出版的工作由鄭承峰通識教育研究中心負責，圖書的內容涵蓋哲學、物理、社會學、文化等等。這次出版的通識書籍，內容豐富，與過往的書籍比較毫不失色。這不但是中大同學的福氣，也是各位讀者的福氣。

撰寫通識書籍，是頗難的一樁事情。作者須引領讀者，重新審視平常生活裏很多被人忽視的東西，還要言簡意賅，解釋一些看似艱澀難懂的概念。「通識教育叢書」專為繁忙的都市人而寫，雖然不是厚甸甸的巨著，卻沒有放棄嚴謹準確的原則。我希望讀者能多用上下班乘車的機會，暫且放下手機，花一點時間閱讀這些書籍，

待作者帶領你去漫遊不同的國度、時空、文化，增廣見聞，用知識點綴生活。我相信只要你持之以恆，必能有所進益。

人生匆匆幾十寒暑，有些人淡泊自甘，有些人則汲汲於名利；有些人一生順遂，有些人卻失意無依。人生有許多的歡愉，更有不盡的無常和無奈。我們身處其中，如何進退迴旋，那需要審時度勢的機敏，鑑別善惡的明慧，以及敬讓謙和的虛心。人的稟賦各異，但我們卻可以藉教育改善自己。當然，有時間和機會多讀好書，親炙智者，那就最好不過。但生活忙碌或已離開校門的朋友不要失望，「通識教育叢書」正是為你編寫。不論你是否中大的學生，我也誠意邀請你進入通識教育的課堂，與我們談天說地。

最後，我必須藉此機會，感謝社會對中大通識教育的支持和讚譽。中大通識基礎課程獲美國通識及自由教育課程協會，頒授「2015年通識教育優化模範課程獎」。這項殊榮，使我想起當年創校先賢的遠大目光和開拓精神，以及承先啟後所須付出的努力。我們將再接再厲，貫徹中大的教育理想，以及「博文約禮」的精神。

香港中文大學前校長

沈祖堯教授

全球化中的經典閱讀

跨文化與跨學科對話的通識教育

梁美儀

香港中文大學通識教育的傳統

在大學教育中，是否應該有一些共同的、基本的、所有作為「受過教育的人」都應該學習的課程，成為高等教育工作者不斷思考、論辯的課題？「通識教育」的概念自十九世紀被提出後，逐漸成為高等教育中的常設架構。然而，其課程應該如何發展的辯論，卻延續一個多世紀，至今仍未中斷；而通識教育在院校實施的情況，亦經歷了不少高潮與挫折。¹時至廿一世紀的今天，資訊科技發展一日千里，學習形式急速轉變：龐大的資訊儲存系統與電子網絡的運用，使學習不再局限於課堂與課本，網上學習成為不可逆轉的趨勢，傳統大學的教與學方式本身備受威脅；通識教育的存在價值，或應以什麼方式存在，更是當今高等教育所不能迴避的課題。本書的出版，匯集了香港中文大學近年就通識教育的教學及研究成果，正是對此議題提出一種介入與回應。

¹ 關於通識教育發展的歷史和發展趨勢，可參考黃坤錦，《美國大學的通識教育：美國心靈的攀登》（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李曼麗，《通識教育——一種大學教育觀》（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1999）；龐海苟，《通識教育：困境與希望》（北京：北京理工大學出版社，2009）。

要了解今天香港中文大學的通識教育課程，我們需要由香港的教育改革談起。

2005年，香港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教資會）宣佈，所有教資會資助大學課程自2012年起，都要由三年轉為四年制；新增的一年應為學生提供更多的機會修讀通識教育課程、提升語文能力、參與交換計劃，以及在校住宿生活。2006年，香港中文大學（以下簡稱「中大」）制定大學發展十年策略計劃，為大學回復四年制作出準備。校方舉辦了一系列的諮詢會，邀請全校教職員、學生和校友參與。在2006年策略計劃中，大學期望學生畢業時「應已涉獵多種學科及各種常識，……他們應養成博覽群書的習慣，能夠判斷和獨立思考，善於溝通，能在團隊裏合群工作……同學對中國文化應有深切的了解，亦應該懂得接納及欣賞其他文化，以至對不同文化的差異能有敏銳觸覺，廣泛包容，更具有國際視野。」²與此同時，大學決定將通識課程的要求從15學分增加到21學分。如何好好運用這新增的6學分，就成為大學通識教育部需要認真思考的課題。

香港中文大學創校於1963年，以自由教育 (liberal education) 為大學本科教育的理想，堅信大學教育使命不僅在於為社會提供個別領域的專才，更要培育博學開明、具有廣闊視野的公民領袖。³通識教育作為體現自由教育理想的課程，自始即是中大本科教育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大早期的通識教育主要由創校成員書院（崇基學院、新亞書院和聯合書院）負責，各按其教育理念與傳統而設計推

²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trategic Plan 2006*, <https://www.cuhk.edu.hk/strategicplan/english/documents/cuhk-strategic-plan.pdf>, 2020年11月3日檢索。

³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The First Six Years 1963–1969: The Vice-Chancellor's Report*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1969).

行。1986年起，通識教育課程經過改革與整合，分為大學通識與書院通識兩部分。書院通識開設學生為本課程，配以書院生活、舍堂氛圍，關注學生在大學的學習與個人成長；大學通識則著重知識視野的開拓和智性能力的提升，採用了分佈修讀模式 (distribution model)，將知識分為不同範疇供學生選讀，學科由各學系提供。至2004年，中大對其通識教育課程作出全面檢討，重新規劃「大學通識」部分，將當時既有的、由超過40個學系提供的二百多門科目，劃分為「四範圍」。四範圍根據新亞書院創校元老之一唐君毅先生對人類智性關懷的理解而設計，包括了「中華文化傳承」、「自然、科學與科技」、「社會與文化」及「自我與人文」，學生必須在每個範疇中修讀至少一科。

四範圍的劃分在精神上繼承了中大的人文傳統，在課程形式上則沿用了通識教育模式中的分佈必修 (distribution requirement) 類型。它的優點是覆蓋面廣，涵蓋了一所大學認為學生應要涉獵的不同知識範圍、學科方法和價值，可以拓展學生知性視野；而且在資源分配和師資運用方面，分佈必修依託於大學既有的院系，實施比較方便。因此，分佈必修亦是多數大學採用的通識教育模式。⁴

新增的6學分，是否就應該沿用四範圍模式，讓學生在自選的範圍中多修兩科？我們經過多方研討和考慮，選擇了另一條路徑：為四範圍建立一個核心基礎。

因應大學2006年的策略計劃，原有的分佈必修的確可以保證學生「涉獵多種學科及各種常識」；而「對中國文化有深切的理解」，亦可以透過「中華文化傳承」這一範圍達成。然而，對其他文化的欣賞只是零星散落在某些「社會與文化」範圍的科目之中。由各院系提供

⁴ J. G. Gaff, *General Education Today: A Critical Analysis of Controversies, Practices, and Reforms* (San Francisco: Jossey-Bass, 1983).

的通識學科，各自介紹學科視野，並不能確保大學培養出「有敏銳觸覺，廣泛包容，更具有國際視野」的學生。同時，要培養廣泛閱讀的習慣、提升獨立判斷的能力及增加有效的協作與溝通能力，則必須讓這些學習成果在所有課程的設計中成為清晰的學習目標，並運用與目標相配合的學習活動、評核體系一以貫之，才可以達到。由各個學系提供的通識科目，各自精彩；要勉強統一，亦不易達到理想效果。分佈修讀模式還有一大弱點：這類課程並不能創造共同學習體驗；課程中每科都是獨立設計，未必有考慮和其他科目之間的聯繫，質素也參差不齊。⁵ 2004年的通識教育改革，雖然以人類的四大基本智性關懷為框架，但對於學生來說，整體課程的意義還是不明顯；改革同時建立了清晰系統的評核機制，但這機制只能確保每個學科的質素，對建立課程總體的連貫性幫助不大。2005年，大學通識教育部做了一項研究，以網上問卷及隨後的聚焦訪談形式進行。研究發現，學生難以察覺課程整體的連貫性和意義所在。⁶ 很顯然，單純以分佈修讀模式建設課程並不完全理想。額外的6學分，正給予中大一個完善通識課程的契機。

建立核心元素

就通識教育發展的歷史考察，除了分佈必修外，另有一種具有相當影響力的課程模式，即共同核心課程 (common core curriculum)。與分佈必修追求知識涉獵的廣度不同，共同核心課程強調的是：有

⁵ P. L. Gaston and J. G. Gaff, *Revising General Education—and Avoiding the Potholes* (Washington: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2009).

⁶ 楊杏文，〈理想與現實的矛盾——香港中文大學學生聚焦小組研究及分析〉，《大學通識報》，總第二期（2007）。

些知識和能力，應由所有稱得上受過教育的人共同擁有。曾任芝加哥大學校長的著名教育家赫欽斯 (R. M. Hutchins, 1899–1977) 就曾提倡「經典名著課程」(Great Books Program)，認為西方經典是人類思想的高峰，應作為大學教育的共同核心，以提升學生的智性能力與培養自主學習的習慣。雖然赫欽斯的方案並沒有在芝加哥大學全面實施，但其後該校的通識教育亦以核心課程形式推行。⁷ 另一個著名例子是哥倫比亞大學在1919年開始設立的「當代文明」(Contemporary Civilization) 課，全校學生必修，及後更擴展至包括文學、音樂、藝術、科學等規模龐大的課程體系，其中「當代文明」、「文學人文」(Literature Humanities) 均要求所有學生閱讀一系列經典原著，音樂、藝術則要求學生學習非文字的經典。這類核心課程對大學教育有明確的理念，課程的統整性亦較強，而更重要的是，它的教學效果亦較優勝。核心課程的優勝不僅在於推行者(如赫欽斯)能從理論的高度去思考通識教育是什麼；實證的教育研究顯示，核心課程的教學效能較高，對學生通識教育學習成果有明顯的、正面的影響。

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著名教育研究學者亞歷山大·阿斯庭 (A. W. Astin) 自二十世紀六十年代開始對美國大學本科生進行追蹤，研究不同大學的類型和學習經驗對學生的影響。自七十年代起，研究加入搜集了大量不同大學通識教育課程特質的資料。他在九十年代初發表的《大學最重要的是什麼？——重溫關鍵的四年》書中，以24,847個大學生由1985至1989年間的追蹤調查為樣本，全面評估大學教育對學生學習和發展的影響。⁸ 研究的結果顯示，90%以上大學

⁷ General Education Review Committee, *General Education Review Committee Final Report*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2016).

⁸ A. Astin, *What Matters in College?: Four Critical Years Revisited* (San Francisco: Jossey-Bass, 1996), p. 4.

的通識教育課程採用分佈修讀模型。但無論課程範疇的數量多少和包含的內容如何，對學生學習成效的影響都微乎其微；反而是極少數學校（5%以下）推行的「通識教育真正核心的跨學科模型」（the true-core interdisciplinary approach to general education），要求所有學生修讀共同科目的課程，卻確實對通識教育學習成果有普遍的積極影響。⁹ 阿斯庭認為，真正核心課能發揮正面的影響力，是因為它能提供一個共同的經驗，刺激學生課外的討論和建立緊密的同儕連繫。必修的共同核心課創造了一個最能確保學生投入學習的環境，學生能與老師和同儕互動：「當學生投入了大量的時間，和不同背景的同儕相處學習、互相指導，並且一起討論當代的重要議題，通識教育的學習成果才會得到提升。」¹⁰ 因此，共同的學習經驗與和主動投入學習的進路，比課程的形式與內容更重要。¹¹

阿斯庭研究的結論亦被近年一系列關於如何提升大學生學習成果的研究印證，包括大學一年級生就讀體驗（first year experience）、高效措施（high-impact practices）和學生參與（student engagements）等問題的研究。學生從中學的學習環境進入大學最重要的轉變，就是從較被動地接受知識轉變為主動地尋找探索新知，實現真正的自主學習。這樣，學生寫作、閱讀和討論能力必須大大提高之餘，能與同儕間建立知識社群、理解課程的一貫性、建立所修學科之間的聯繫，以及將所學知識與社會及生活經驗關聯等，對學生能成功地適

⁹ Astin, *What Matters in College?*, p. 425.

¹⁰ Astin, *What Matters in College?*, pp. 425–426.

¹¹ M. Y. Leung, “From Liberal Education to General Education: Change and Continuity in the Philosophy of University Education,” in *General Educa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Global Citizenship in Hong Kong, Taiwan and Mainland China*, ed. J. Xing, P. Ng, and C. Cheng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2013).

應大學學習、提升學習成效至為重要。¹² 在仔細研究現有文獻、研究成果和參考其他高校的實行措施後，我們提議在中大引入一個共同核心元素，以補充原有的分佈修讀模式。這新核心課程的設計與結構緊密貼合一系列目標，包括：除了傳統中西文化之外，提高學生對其他不同文化的了解；有效地幫助他們發展良好的智性習慣；學習活動要有系統地提升他們閱讀、理解、反思、推理、溝通和判斷的能力。

由此建立的通識教育基礎課程 (General Education Foundation) 以經典篇章研習、小組研討模式進行。這6學分的課程包含兩門共同核心科目：「與人文對話」和「與自然對話」，分別聚焦人文與科學。

與赫欽斯提倡的經典閱讀課不同，基礎課程雖然運用經典作教材，但歷久彌新的大問題才是課程開展的主軸。「與人文對話」以探究「何謂美好人生」和「什麼是理想社會」兩大課題為主，透過研習《會飲篇》、《論語》、《莊子》、《聖經》、《古蘭經》、《社會契約論》、《明夷待訪錄》等經典作品，讓同學認識不同文化、宗教和思想如何提出並回應這兩大問題，以及探索兩者的關係。「與自然對話」則關注科學探究中獲得知識的原理和成就，審視科學理解的方法和限制，以及它對人類與自然關係的啟示，研讀篇章包括《理想國》、《數學原理》、《物種起源》、《寂靜的春天》、《中國的科學與文明》等經典。

¹² G. D. Kuh, “Student Engagement in the First Year of College,” in *Challenging and Supporting the First-Year Student: A Handbook for Improving the First Year of College*, ed. M. L. Upcraft, J. N. Gardner, and B. O. Barefoot (San Francisco: Jossey-Bass, 2005), pp. 86–107; G. D. Kuh, *High Impact Educational Practices: What They Are, Who Had Access to Them, and Why They Matter* (Washington DC: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2008); E. T. Pascarella, “Cognitive Impacts of the First Year of College,” in *Improving the First Year of College: Research and Practice*, ed. R. S. Feldman (Mahwah, NJ: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2005), pp. 111–140.

課程選用來自不同學科、不同文化傳統的經典作品，讓學生接觸塑造當今世界的、重要而不同的思想來源，提升他們對跨學科、跨文化的敏銳觸覺，為他們成為全球公民打好文化的根基。這兩門科目提出關於人生、社會和知識的重大問題，也透過同學對這些經典作品的反思，讓他們在校園學習和人生經歷間建立聯繫。

閱讀同一套經典篇章和討論相同主題，可為學生提供共同學習體驗，塑造他們對人類存在共同關切的問題的敏銳觸覺，智性的對話就此展開，學習社群也由此建立。這共同的學習體驗在大學一年級開始。由於課程要求學生閱讀較為艱深的文章、比較和欣賞不同的文化與價值觀，並就關於人類存在的一些歷久彌新的大議題進行討論與寫作，因此修讀的經驗同時是培養學生閱讀、思考並討論那些複雜而嚴肅的話題的習慣。在大學起步時磨練出良好的閱讀、寫作、思考與溝通的能力，可讓學生日後學習乃至追求人生目標的過程中受益。整個課程的模式鼓勵學生積極學習、自主參與，也為通識教育乃至大學學習設置了很高的標準和期望。

儘管以經典作品為主要的學習材料，但我們和上世紀四十年代的通識教育運動所奉行的宗旨有兩大不同。¹³ 首先，與一般經典名著的「正典」概念不同，基礎課程所用的經典教材並不被視作絕對權威。選擇這些篇章是為了幫助學生去反思那些對生活十分重要、卻未必會在主修學習中問及的問題。這些篇章是一個引導同學接觸和反思問題的媒介。這些關於人生、社會和知識的大問題，從古至今經歷不同文化的無數人不斷反覆思索，本來就沒有固定的「正確」答案。在課堂討論和寫作中，對篇章中提出的問題，老師會有技巧地引導學生探索他們自己的答案，學生要引用他們認真審視過而認為

¹³ E. McGrath, "The General Education Movement: An Editorial," *Journal of General Education*, 1 (1946): 3-8.

適切的觀點，自己去深思、去批判，從而建立出自身的人生觀。第二，選取的經典不限於西方傳統的人文經典。兩科分別關注人文與科學，節選的經典篇章則來自不同的傳統與學科。例如「與人文對話」中就包含了中、西、希伯來和伊斯蘭文化的經典；而「與自然對話」則選錄了物理、生物、生態、神經科學、幾何學等學科的奠基性作品，同時與傳統中國的自然觀作對比。接觸這些篇章為學生提供了一個真正的多學科、多文化的世界觀，讓他們掌握那些塑造人類文明的重要思想。

本書的編者與作者皆是通識教育的踐行者，深信通識教育實為開啟學生智性與心靈修養的一扇窗。他們大部分都曾任教中大的通識教育基礎課程，對以閱讀經典作為通識教育有豐富的實踐經驗。本書的若干文章，正是與教授經典為本的通識教育的研究與反思相關，內容包括經典教育的價值論爭、文化批判及教學策略等。而在教學工作以外，眾多作者皆各具專業，乃各類人文及社會學科的研究者，故大部分文章均會藉分析經典文本的進路，探討自我意識、道德問題、信仰與苦難、社會制度等與幸福人生及美好社會有關的價值議題，務求讓讀者感受到經典閱讀與價值探究的緊密關係。本書的編著及出版，除了分享中大近年通識教育發展的成果外，更希望將學院的通識教育推廣給社會大眾，讓人文經典轉化我們的自我認知與價值關懷，對生命與世界有更深刻的把握。

就如美國哲學家瑪莎·納斯邦 (Martha Nussbaum) 所說，「在緊密聯繫的複雜世界裏培養我們的人文素養，需要理解人們共同的需求和目標，是如何在不同的環境下以不同的方式實現」，而「當務之急是要引導所有的本科生對世界歷史、世界主要的宗教有基本的理解」。¹⁴

¹⁴ M. Nussbaum, "Liberal Education and Global Community," *Liberal Education* (Winter 2004): 45.

我們也相信，建立連繫科學文化與人文文化之間的橋樑同樣重要。我們希望通識教育基礎課程可以帶領我們在「幫助年輕人學會為自己發聲，並尊重別人的聲音」，以此培養「善於思考、有潛在創造力的世界公民」的目標上更進一步。¹⁵ 我期望各位信賴人文素養的讀者，能在閱讀本書時經歷一趟以經典作為思考啟發、連結自身與他者的價值反思旅程。

¹⁵ Nussbaum, “Liberal Education and Global Community,” p. 44.

編者的話

香港中文大學自創校以來，一直重視通識教育，更是亞洲地區推動經典為本通識教育課程的先行者。自2012年開始，中文大學通識教育部在大學全面推行的「通識教育基礎課程」(General Education Foundation Programme)，讓所有本科學生不分科系閱讀人文科學與自然科學的經典。數年以來，課程在校內的發展已經穩定，學生整體反應正面，口碑漸見，教師團隊亦累積了一些對經典教育的想法，遂有意再進一步向外分享人文經典通識教育的理念。本書的出版，可以說是香港中文大學對基礎課程的階段整理，亦是我們對於通識教育的一份承擔。

書名《字裏人間》，啟發自山田洋次執導的同名日本電影。電影改編三浦紫苑的原著小說，描述男主角編纂字典的刻苦歷程，洋溢著對文字的熱愛和執著，寄寓人間溫情。本書借用「字裏人間」為名，卻無意將編字典與讀經典直接類比——我們既沒有追本溯源的欲望，也不認為文字的意義應該由某本「聖典」定於一尊。換言之，經典教育並非在「字裏行間」窺見「微言大義」。我們的通識教育基礎課程相信文字或文本是開放的，隨著時代處境而有嶄新的意義。所謂「字裏人間」，我們想帶出經典閱讀是一趟從文字出發、走向共同探究(communal inquiry)的知性與價值實踐旅程。這種「字裏」與「人

間」的互動，表明當代的經典教育必然是一個文字與社群相互創造的過程。

本書的編輯理念與基礎課程相關，而又另有新意。在基礎課程中，觸及人文經典教育的是「與人文對話」一課。課程以東西人文經典為本，輔以各式人文主題，探討美好人生與理想社會的理想形態。本書承襲課程的基本理念：以經典為中心的通識教育深具意義，人文經典牽繫我們當代生活的核心價值。在這個基礎上，本書比起基礎課程更著重呈現人文經典與當代價值問題的關聯，展示我們如何透過經典處理一些重要的人文議題，例如情感、理性、盼望、苦難、公義等。我們的編纂目標很清晰：不是經典引介，也不是課程回顧，而是直接以經典介入議題，透過研讀經典引發讀者思考美好人生與理想社會的條件、規範和準則，藉此體現經典為本的通識教育意念。最理想的情況，是讀者能夠體驗到這種將經典與人文價值問題連結的問題意識，培育一種通古今（經典）、辨是非（價值）的能力，重新審視一己生命與時代關懷。

本書分為四個部分。第一部分綜論通識教育與人文經典的關係，從價值教育、詮釋方法及情感培養的角度，分析經典為本的通識教育方針。第二部分探討自我問題，從柏拉圖對話錄、《論語》、《莊子》剖析我們如何透過建立自身的能力——理性、情感、自由——締造美好人生。第三部分圍繞信仰與生命，從佛教、基督教、伊斯蘭教的角度，論述人們如何在各種存在狀態中回應盼望、苦難、和平的意涵，並連結至死亡與超越性的討論之中。第四部分轉向社會政治領域，藉著盧梭、亞當·斯密、海耶克、馬克思的著述，討論政權認受性、自由市場及勞動正義等社會公義問題，探索理想社會的形態乃至實踐的可能性。

除了上述的四個部分，本書的「序」與「附錄」一前一後、扼要地勾勒了中大經典教育的理念。綜觀全書，輯錄文章大多透過經典直

接介入議題，較少闡述中大通識基礎課程的內容。我們慶幸現任中文大學通識教育部主任梁美儀教授為本書賜序，序文詳細闡釋中大通識教育及人文經典教育的理念，為讀者踏入經典的價值思辨旅程樹立了座標。我們亦慶幸前任中文大學通識教育部主任張燦輝教授接受我們的訪問，憶述「與人文對話」和「與自然對話」的緣起，為本書補充了珍貴的歷史片段。兩位主任向我們示範了如何將抽象的理念具體地落實於中大，若然讀者能夠多理解中大的通識教育，必然更能認識人文經典的價值轉化效能。

在此我們要向各方友好致謝。首先是行政上的支援。本書得以出版，實有賴梁美儀教授的鼎力支持與趙茱莉博士的協助。我們亦感謝中大鄭承峰通識教育研究中心的林綺琪小姐，幫忙處理編務。其次是每一位供稿的作者。一眾作者雖然術業各有專攻，包括文學、哲學、宗教、政治學等不同學科，但是在經典教育上卻有著同樣的信念與堅持——相信透過學習原典可以訓練批判思考，乃至實現價值轉化。同時，作者大部分是通識教育基礎課程「與人文對話」的老師，我們非常感謝他們在繁忙的教學工作下，仍然樂意參與撰寫本書。另外，我們亦要向任教另一科基礎課程「與自然對話」的諸位老師致意，縱然「與人文對話」和「與自然對話」分屬於兩個教學團隊，卻又合作無間，本書可以視為兩個團隊砥礪下的成果。此外，本書的封面由曾修讀「與人文對話」的中大舊生葉采鑫設計，亦展示了人文經典教育的傳承與轉化。最後，我們要感謝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的編輯與設計同事在本書的出版過程中的專業協助。

本書以學術規格撰寫，卻也適合對人文經典有興趣的一般讀者。如果你對大學通識教育感興趣，我們希望你可以體驗香港中文大學這幾年間的學術成果。如果你對生命、道德、苦難、公義等議題有困惑，我們希望與你共同思考美好人生與理想社會的圖像。

歡迎踏上這趟以經典為本的通識教育之旅。